

我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老年人口年均增加 800 万

一亿老年人,今后怎么养老

面对“银发浪潮”的冲击,“未富先老”的中国显然准备不够

“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儿山高水远他乡留”,一句心酸的歌词道出对养老问题的担忧。

有人说,“21 世纪是老人的世纪”,中国尤是。日前,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指出,中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老年人口由年均增加 311 万人,发展到年均增加 800 万人。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数据,2007 年,中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04 亿,到本世纪 40 年代,将达到峰值 3.2 亿。届时,平均每 5 个人中就有 1 个 65 岁以上的老人。

专家预测,中国人口红利期将在 2033 年关闭。之后,社会总抚养比迅速上升,在本世纪后 50 年,达到 80%以上,意即每 10 个劳动年龄人口至少抚养 8 个人。现在,距离这个窗口期,只有 24 年。

面对“银发浪潮”的冲击,“未富先老”的中国显然准备不够——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式微而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匮乏。

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老龄化挑战,如何抓紧时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服务模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命题。”

养老新模式——

住在家里,社区提供服务

初秋是北京,天高云淡。北京西城区月坛街道西便门社区服务站里,广电总局机关食堂的送餐员运来 12 份刚出锅的午饭:熘肉片、时蔬炒鸡蛋、凉拌豆腐丝、热腾腾的发糕和米饭。70 多岁的王大妈与另外两位老人在餐桌旁坐下,李大爷等人则取走盒饭,回家用餐。“10 元钱能吃上热乎饭,比在家凑合强多了!”

“月坛街道有 2450 户‘空巢’家庭,‘吃饭难’是他们的普遍问题。今年 6 月,我们与辖区内的广电总局机关食堂签约,推出送餐服务。”该街道



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罗代红对记者说,“2005 年以来,我们已签约 21 家服务商,为老人提供理发、洗澡、修车、修脚等上门服务,收费比市场便宜。”

“让老人住在自己家里,由社区有关服务机构和人员提供上门服务或托老服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所长王虎峰介绍,这种养老服务模式是一种世界趋势,也是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方向。

“老年人要有‘三老’——老友、老窝(住房)、老底(存款)。”退休在家的郭女士对记者说,“如今,孩子们都忙,我们老年人要有自己的生活。身体能自理时,当然在家养老,既自由又经济。”全国老龄委一项关于城市老年人居住方式的调查显示,90%的老年人愿意居家自我照料。考虑经济等因素,老年人多数不请保姆,一些“空巢”或丧偶老人急需社区等服务机构的关照。

王虎峰说,过去,发达国家解决养老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养老院,后来发现,集体养老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情感慰藉和精神需求。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上推行“就地养老”,把老年人在家居住与社会提供服务结合起来。2000 年,我国开始居家养老服务试点,目前,大部分大中城市已不同程度地开展该项工作。

服务供需脱节——市场认同度不高,专业队伍稀缺

经过几年探索,我国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但相对于社会

期待,落差较大。

调查显示,目前城市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总的满足率只有 15.9%,其中家政服务满足率为 22.61%,护理服务满足率为 8.3%。

哪些因素影响居家养老服务做大做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认为,我国民众对居家养老概念有误解。与传统家庭养老不同,居家养老是家庭、社会、政府多方责任共担的一种新机制,既包括政府购买服务,也包括老年人自己购买服务。

如今,社会上宣传最多的是政府购买服务,给人们造成“居家养老服务就是政府为城市自理有困难的老人购买服务”的印象。由此带来的“家庭照料期望移植政府”,既加重政府负担,也影响该制度可持续发展。

由于认识不到位,居家养老目前还未被老年人广泛认同,市场需求不足,缺乏规模效应。服务商对老年人需求认识不够,提供的服务产品不够细化,供需存在脱节现象。现有的一些具有市场运作雏形的服务项目,布局过于零散,辐射范围大多囿于一两个社区,服务的老年人多则百人、少则十数人,经济上缺乏规模效益,一来导致服务价格较高,老年人承受不起,无法扩大市场范围;二是收入不足以弥补成本,亏损经营,难以长久发展。

缺乏专业化服务队伍也是一个软肋。目前我国对居家养老服务没有明确的职业定位,居家养老服务员多被等同于普通的家政服务员,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较低,不仅难以吸引专业护理人员,而且大中城市的本地人也不愿从事该工作,外来务工人员又存在语言不通和生活习惯差异较大等问题,服务人员少、素质不高、队伍不稳定,影响了服务质量。

养老院冷热不均——城区“吃”不了,郊区“吃”不饱

“这里有投脾气、聊得来的老伙伴,有人给做饭,生活也规律。我妈现

在已不愿回家,房子都出租了。”在北京瀛澜养老院,探望母亲的吴女士对记者说。两年前,吴女士的父亲乘鹤西去,70 多岁的老母苦于“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日子,又不愿到儿女家添麻烦,于是住进养老院。

随着年龄、健康等状况变化,人们在哪儿养老的选择也会改变。根据中国老年科研中心调查,目前全国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独居)比例已达 49.7%,其中,1/6 的老人因生活不能自理或因孤单而愿去养老院。

然而,目前能接纳老年人的养老机构 and 设施非常有限,全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 3.8 万个,养老床位 120.5 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 8.6 张,与发达国家 50 张~70 张的水平相去甚远。

今年 97 岁高龄、家住北京朝阳区水碓子的赵根老人卧床多年,女儿跑遍附近的敬老院,“一床难求”。据统计,北京、上海等城区的养老院普遍入住困难,床位缺口非常大,排队等待少则三五月,多则一两年。而郊区养老院却“吃不饱”,床位空置率多达四成。

“家门口的敬老院没床位,我妈就去了郊区。但那里没有医务室,而且要想看病报销,就得回市区的定点医院。”为免奔波之苦,吴女士给母亲换到现在这家离市区半小时车程的养老院,“它有医务室,去市里看病也方便。”

城区养老院“吃不了”,郊区养老院“吃不饱”,北京市民政局福利处副处长魏小彪分析,一个重要原因是养老机构布局与群众需求不匹配。北京市郊区有 170 多家养老院,而且有入住需求的老人多集中在城区。老人们不愿去交通不便、医疗配套设施相对薄弱的郊区养老。市中心不少养老机构条件并不好,但因方便家人探望、就医便利,受到欢迎。

养老资金匮乏——制度性安排不足,消费理念陈旧

“居家养老为主,机构供养为辅”

是我国养老保障服务发展方向。如何解决二者面临的发展难题?

“舅舅住在养老院里很寂寞,每次我去看他,他都流泪。”王先生的舅舅单身一生,晚年孤寂。“目前,养老机构的集体赡养在生活照料方面是有效的,但在精神慰藉方面存在不足,这是多数人不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主要原因。”魏小彪说,养老服务机构下一步发展需要提高服务质量,完善服务功能,加强心理慰藉、医疗保健、休闲康复、临终关怀等服务。随着越来越多老年人经济收入稳定,“银发经济”将带来商机,养老机构服务功能越好越全的,入住率越高。

“养老院的医务室是不是医保定点机构,也是影响人们选择机构养老的因素。”魏小彪说,目前北京市医疗保险定点单位的养老机构不到 10 家,有关部门应加快养老机构进入医保定点单位的进程。

此外,随着老年福利制度从传统的救助型向普惠型转变,政府在财政能力不足的现状下,应提倡“花钱买服务”的消费理念,逐渐加深民众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认同感,逐渐改变老年人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将老年人的有效需求与服务商的引导性消费结合起来,推动居家养老需求形成一定规模的市场,加快居家养老服务市场化、专业化的步伐。

据《人民日报》



遏制“带血的煤”

——山西“小煤窑”终结的背后

山西省今年推出了煤炭改革新举措,到 2010 年底,数千“小煤窑”将被兼并,数千名山西“煤老板”也从台前隐退到幕后,这一现象被称为该省煤炭历史上最大的“经济事变”。

“小煤窑”隐退能否缓解煤矿安全事故的频发?煤炭企业兼并不能否缓解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能否遏制“官煤勾结”带来的严重后果?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

老板变身:是不是国有吞并民营?

“小煤窑”因生产方式落后、管理水平低下、不安全、不符合产业政策甚至违规开采等问题,近年来成为社会各界口诛笔伐的对象。山西省一位领导曾总结了小煤窑的四宗罪: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草菅人命、腐蚀干部。此次进行的煤炭资源重组,针对的就是小煤窑。

兼并重组之后,山西煤炭产业结构将发生历史性变化,企业主体从此

前的 2200 家缩减为 130 家,煤矿在原有 2600 多座的基础上压减 60% 多,只保留 1000 座矿,国有或国有控股煤矿由过去产量占全省煤炭总量一半左右、矿井数量只占小部分,转而成为绝对主导地位;兼并重组整合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 300 万吨,单井产能不低于 90 万吨;煤炭生产全部实现机械化开采;煤矿高管逐步实现职业化和专业化,全员培训后上岗。

由于此次兼并主体企业是同煤集团等国有重点煤炭企业,于是有人担心,会不会是国有企业吞并了民营企业?

山西省左云县水磨湾矿原矿长高华告诉记者,他的年产 30 万吨的小矿并入了国有企业——山西省煤运集团。在兼并重组后新成立的公司中,双方商定山西煤运和水磨湾矿股份比例为 6 比 4。和水磨湾矿一样,60% 左右小煤窑选择的是与省内、中央大型煤炭企业签订兼并重组协议。

在资源整合过程中,少数“煤老板”选择转让产权,进行转产转型,退出煤炭行业;多数则选择成为兼并后新企业的股东,退隐后台,不直接干

预煤矿生产经营。一部分做大做强的民营煤炭企业也参与了兼并小煤矿。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公司董事长贾延亮说:“原来我公司 21 个小矿加起来才有 120 万吨的产能,现在整合成 5 个煤矿,产能达到 620 万吨!”

煤炭大集团主推的煤、焦、冶、电、化、建材等循环经济园区将相继建成。山西国土资源厅厅长李建功展望说:“在神华、同煤等大集团看到的‘矿区像宾馆,矿工像白领’不再遥远。”

企业兼并:能否换得安全生产?

山西“小煤窑”数量长期保持在五六千座以上,目前年产 30 万吨及以下的煤矿仍占矿井总数的 80% 以上,综合机械化采煤的仅占煤矿总数的 12%。据不完全统计,大约 90% 的煤矿事故都发生在地方小煤矿。

企业兼并,能否换得安全生产?山西省煤监局局长杜建荣分析说,首先是提高企业门槛和准入,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来提高安全生产能力。此轮企业兼并,煤矿全面采用机械化综采,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将减少 74%。

这个数字从何而来?杜建荣说,

煤矿数量从 2600 座减少到 1000 座,按简单数学概率算,事故发生率将比现在降低 60%;实行标准化作业后,井下危险岗位和从业人员将大幅减少;此次兼并重组后的煤矿有望消除短期行为带来的超能力生产等安全隐患。同时,资源枯竭或储量较少,资源赋存条件差达不到机械化综采要求的煤矿,将在这次整合中予以关闭,资源予以封存。

行业整合:能不能阻止“官煤勾结”?

矿难多发,不仅与安全管理和监督有关,还与“煤老板”同官员之间的利益交换有关。

解剖一起典型的“官煤勾结”案例即可说明这一问题,如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受贿案。

经查,临汾发生数次矿难的“煤老板”,均有向苗元礼行贿的记录。其中,2007 年包括遇难多达 100 余人的洪洞“12·5”矿难,事后被查明,以苗元礼为首的临汾三级煤官,均在接受贿赂后,监管放松最终导致惨剧发生。

山西省纪检委有关人士分析说,过去的“官煤勾结”,是小煤矿证照不

全、安全生产不达标或不符合产业政策,“煤老板”为了逃避监管牟取暴利,总想寻求权力“保护伞”。如今“小煤窑”不存在了,行业的门槛儿提高了,不是有钱就能开煤矿了,过去“官煤勾结”的链条断了。但是,“煤老板”退出经营不等于腐败就会消失,资源领域的权力寻租行为在“审批经济”的条件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反腐败的斗争和制度建设仍然是长期的。

据新华社

